



周恩来：我党我军电讯工作创始人



周恩来在西柏坡。(资料照片)



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得很明白：“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而周恩来就是以超凡的仁义才智，成为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创建了中央特科，同时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创始人。 ■ 魏安仁 据《湖南日报》

中央特科是个什么科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他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半个世纪。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曾于四五月间转移武汉，同年八九月间又迁回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在敌探监视下活动，随时可能遭到打击和破坏。若不开展隐蔽斗争，就不能保卫自己。根据形势需要，周恩来总结以往工作经验教训，特别是汲取“4·12”反革命政变带来的惨痛教训，提出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防敌探的破坏，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1927年开始建立中央特科。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周恩来借鉴苏联建立“契卡”的经验，对中央特科规定了“三

任务一不准”：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惩处叛徒，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同时，周恩来通过实践，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且摒弃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的一些做法，始终将中央特科置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使它成为党的坚强战斗堡垒。

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部署，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构中拉出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派人打进敌人心脏，深入最高敌探机关，掌握敌人核心机密；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党的生死存亡攸关的紧要关头，中央特科保卫了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安全。

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豪密”

周恩来也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的

创始人。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4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他还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

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两地电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随后，在全国各地红军中和各大城市，普遍建立无线电通信工作，沟通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电讯联系，有力配合正面战场。这在党的电讯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飞速发展，还在上海建立了国际电台，及时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上海弄堂里神出鬼没的“胡公”

由于中共中央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追捕的重要目标。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加危险。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对，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

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周恩来把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之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马路，多穿小弄

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

周恩来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拟俄文密报急发斯大林

二战期间，阎宝航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在一次社交场合获得德国1941年6月20日前一周内将突袭苏联的情报。周恩来得此报告后，马上作出此情报真实可信的正确判断。为了不耽误时间，他直接用俄文拟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延安总部立即通报莫斯科。

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报告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同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收到若干份分析预测性情报信息的基础上，潘汉年从一位留港要人处获悉美国作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估计，于是当机立断向延安总部发出“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于6月20日及时转告苏方。事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情报使得苏军能提前24小时进入战争状态。

另外，潘汉年情报系统还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所获取的战略情报：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南进而不是北进。苏联在获取此类情报信息基础上，才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

阎宝航还侦获日本王牌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的书面材料原件，包括军队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部队番号人数等。周恩来立即令南方局拍照报送延安并通报苏联。这使得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开战后，按图索骥、势如破竹地突破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工事，使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做最后挣扎的幻想彻底破灭。

历史证明，周恩来和他领导下的中共情报战线在搜集提供战略情报、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方面立下了特殊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励：狱中“红色信使” 28岁慷慨就义

“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1933年，28岁的黄励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墙上留下这句遗言后，从容走向刑场。她被枪决的直接原因，是在狱中仍坚持斗争，策反了看守所班长，使之成为传递情报和信息的“红色信使”。她的牺牲，让更多的人看清了敌人的丑恶嘴脸，走上革命的道路。

黄励，1905年3月出生于湖南益阳一个贫民家庭。1924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黄励被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1年10月，黄励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党组织安排她担任中华全国济难互济总会主任兼中共党团书记，主要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救济烈士和被捕同志的家属。为营救被捕的同志，黄励想方设法多方寻找可靠的社会关系，联系社会知名人士，聘请有正义感的律师，组织和动员群众请愿，向反动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等，使许

多被捕同志获释出狱。

淞沪抗战期间，黄励积极参与组织沪西日本纱厂女工罢工和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日。1932年，黄励被调往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同年冬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参与领导重建党的组织，坚持地下斗争。

1933年4月25日，因叛徒出卖，黄励被捕，两天后，被作为“要犯”急速押往南京，关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看守所，黄励争分夺秒，为革命做工作。她给难友们讲革命故事，教大家唱《国际歌》，鼓舞大家的斗志。她还把革命宣传工作做到了看守身上，向看守们讲述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经过黄励的不断引导教育，看守所班长张良诚等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张良诚暗中传递消息、信件，汇报某些人的叛变行为，成为狱中“红色信使”。

不久，张良诚暴露，宪兵司令谷正伦大发雷霆：

“共产党的赤化竟做到我的心脏里来了，这还了得！”张良诚案使敌人惊恐万分。他们对黄励又恨又怕，感到不除掉黄励，劝降他人的工作就难以奏效。为此，国民党中央党部批示迅速处决黄励。

黄励知道自己即将牺牲，抓紧将狱中的最新情况写出来，通过秘密渠道传给陈赓。当难友们问她个人情况时，她依然谈笑自若，拍着脑袋幽默地说：“快了，快了，快到雨花台了！”

在开往雨花台刑场的囚车里，黄励对押送的宪兵做了最后一次宣传：“你们都是穷苦人，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就是不让中国的穷苦人翻身。你们杀了很多共产党、革命者，能杀得完吗？越杀革命者越多，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黄励把囚车变成了宣传车，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为革命而奋斗，直到最后一秒钟！”慷慨就义时，她年仅28岁。

■ 宋廷军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